

本报记者 裴立华、魏一骏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科技发展迅猛,文化自觉自信不断增强,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和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学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评价标准西化、评价导向有失偏颇等问题。尤其经济学和人文社科类理论“西强东弱”,已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今年初,经济学家李稻葵撰文指出,中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不适应,不理解,有的甚至觉得中国人偷跑、抢跑、耍赖,占了西方人的便宜。怎么办?需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有中国的理论,理论上不去、讲不圆,咱们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吃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会带来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比如,日本 20 多年的衰退,就起源于 1985 年的广场协议,而广场协议之所以签订,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结束前夜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经济学家凯恩斯为没落的“大英帝国”争得了超额的话语权和利益。

当前,我们很多学术体系基本是按照西方、特别是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存在越来越与“中国经验”脱节的风险。部分教学科研单位学术评价体系西化、评价“重量轻质”等错误倾向,同样值得引起注意。我国要想在世界学术体系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致力于“本土化”“中国化”。

而西方一些学者也指出,中国理应有自己“本土化”“中国化”的体系和自信。《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出版的专著《东方化》已引起西方主流学界的普遍关注,他在 2016 年发表《全球重心东移,西方霸权式微》的文章,再次重申他的“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著名汉学家包弼德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发展,在借鉴世界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更应着眼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加强经济和人文社科类理论“本土化”“中国化”研究已迫在眉睫。首先必须坚持中国道路,构建和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在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和编制指标体系过程中,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鲜明体现学术导向,克服过分注重量化评价、轻视定性评价的弊端。同时,必须大力整顿现在的期刊腐败,建立有重大公信力的学术期刊,最终形成“中国标准”。

其次,要强壮学术筋骨。国际学术话语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根基在学术的内涵与质量,在扎实的学术建设。提高我国学术国际话语权需要的是平心静气、久久为功,需要的是扎根实践,对真问题不懈而彻底的求解。

再次,净化学术生态,维护学术权威。近年来,学术造假、抄袭等不端行为时有发生,中国学术要想迈向国际学术殿堂,必须整治学术腐败,形成强有力的学术话语权和有公信力的评价体系。

## 打造三个体系 迎接数字经济

肖文静

数字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各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落实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数字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具有诸多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特点。比如,数字经济生产要素以数据为核心,产业发展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产业组织以网络型平台化生态系统为主要形式,产业竞争格局以垄断寡头为主体,经济增长以产业融合为主导。

目前,数字经济在我国已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但仍然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薄弱等问题。结合数字经济自身特点,地方政府应着力打造三个体系,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中提高竞争力。

首先是要培育多层次融合产业体系。数字产业的特点决定其必然是一个包括基础设施、协同平台、应用开发的多层次生态系统。因此,地方政府一要进一步加快互联网、通信网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高速、高质、低成本的网络通信服务,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二要主导建设大数据平台、大计算平台、物联网平台等基础平台,鼓励企业等市场主体建设应用服务平台,大力培育龙头型平台企业;三要引导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实现产业深度融合,开发新的应用领域。

其次,要建设多主体协同创新体系。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生命原动力,科学高效的创新体系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创新体系。地方政府要着力建设一个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多主体参与,创新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各创新主体间优化协同良性互动的地方创新体系。

此外,还要完善多元化共治监管体系。数字经济形成的跨区域、跨行业、多主体的复杂生态系统,决定了监管体系需要从传统的政府单向监管转为各主体多元化共同治理的监管。具体来说,政府要为平台和各参与主体赋能免责,明确其权责边界,实现协同共治;要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对平台进行监管;平台对接入其中的各主体进行监管;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产生内生监管力量。(作者为福建省委办公厅改革推进处副处长)

## 学术理论要追求『本土化』

活不困难,未来有希望。

记者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个别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只是做做样子,总结材料应对检查。检查组一走,“留守儿童之家”就上锁落灰,甚至挪作他用。开学时一阵风,开学后无人问,还有些关爱留守儿童的志愿者,搞活动只顾着拍照宣传,待个一天半天就走了,难以对孩子产生真正积极的影响。

对于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来说,最大的问题不再是吃不饱饭,而是塑造健全的人格,确保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出问题。因此,关爱留守儿童,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只满足物质需求、只重视热闹喧嚣而忽视了精神交流。

学校应当想办法把校园打造成留守儿童成长的温馨港湾,为孩子和父母之间搭建爱心桥梁。记者采访时,曾发现一些山区学校设立爱心热线,即在校园内专门开通免费的公用电话。孩子想念父母时,可以打电话给远方的爸爸妈妈。父母惦记孩子时,也能通过电话及时知晓孩子的成长近况。

### “变异”的家长群

如今,不少中小学幼儿园热衷以班级为单位建微信群促进家校联系。然而实际中,原本的交流平台发生“变异”,有的学校在其中发布教学内容,家长好比“助教”一样被绑架在学校教育中,产生心理焦虑的同时,也给学生造成更大的课后负担;有的群还异化成“攀比群”“马屁群”甚至培训机构的“广告群”。

漫画:曹一

问题不在微信群或各类家校联系平台,关键是要让学校教育回归本位,不能借家长群让家长过度扛起学校教育的责任,同时家长也应理性看待家校互动。

本栏编辑:张书旗

## 画里有话

# 评论

本报记者 吉哲鹏、刘晶瑶

## 对于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来说,最大的问题不再是吃不饱饭,而是塑造健全的人格,确保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出问题

差五六十岁甚至更多。这种隔代抚养的家庭结构年龄差距大,不少老人甚至还处于文盲、半文盲的状态。这让留守儿童在学习教育、健康成长、融入社会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开学在即,留守儿童缺的是什么?相比于书包、课本、文具,孩子们最期待的还是家长的陪伴和关心。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自然是加大对贫困山区的教育扶贫和教育投入,扶持产业发展,提升当地城镇化水平,多举措加大对贫困学生、建档立卡户子女的扶持力度,使适龄儿童不因穷困而辍学,同时提升贫困地区薄弱的教育能力,让留守儿童的家长们在家乡就能找到工作,留守的孩子们在村里就能接受优质教育。

当然,对一些深度贫困地区而言,短时期内,外出务工依旧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囿于现阶段的条件,对于留守儿童比率偏高的村镇,更要把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延伸到课堂之外,延伸到他们父母无力触及的地方。

各学校、各扶贫工作队要对有在校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挨家挨户走访慰问,关心他们的吃、穿、用,帮助留守儿童解决返校困难。其中,对于特别困难的留守儿童,可由扶贫、民政、社保、教育、医卫等多部门参与,加强各项救助制度的衔接落实。还应当完善落实留守儿童信息摸排机制,主动为他们提供信息咨询、福利申请和送达。对失责部门和人员,严格比照救助帮扶“守土责任”进行问责,让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生



## 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

本报记者 郑生竹

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坏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监督报道的记者“踢群拉黑”,被曝光的问题就解决了?

近日,《浙江日报》记者报道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之后,竟被西湖风景名胜区政府管委会记者群管理员踢出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西湖景区方面不曾想这一举动会给自己带来另一波负面舆情。

相对于过去一些记者因监督报道被监督对象还以人身攻击等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踢群拉黑”的反应,对记者来说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传干部们患上了“舆论监督敏感症”,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稍有微词,心里就很有气,气血不通后,索性把爱“找茬”的记者们“踢群拉黑”了事。

媒体记者大都有分工条口,例如政法、教育、医卫等,他们或多或少在多位宣传干部们

组建的联系群里。这些联系群本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方便宣传干部们发布本部门新闻、通知例行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但笔者观察到,一些媒体联系群已沦为一些部门“喂食”媒体记者的饲养场。

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记者因此自废武功,丧失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不少媒体记者同行感叹,现在主动联系采访政府部门越来越难,遑论那些监督报道的采访。一些宣传干部越来越不好沟通,有的以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范围不予回应或不接受采访;有的是拖字诀,要求发采访函走程序,请示领导一番三五天过去,得到的答复还是不接受采访。

王钟的

## 文明的进步,有关规则意识,有关个体责任。谁也不能把群体无意识当作借口,你发言的地方就是网络,你的文明程度怎样,网络文明的尺度便怎样

看到这一起起令人遗憾的舆论事件,以及一桩桩悲剧的发生,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反思网络暴力言语的不堪、对人格权利的侵害。然而,更应当反思的是暴力背后的群体狂躁情绪。一个人的言语不至于杀人,群谤的威力则堪比子弹。

大多数网络暴力参与者未必有真正的恶意。一言不合就开“撕”,只是面对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宣泄。很少有人宣泄情绪时会对言语后果有理性预期,在他们眼中,发泄言语暴力的对象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自己看不惯的符号和靶子。

无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之前是否知名,一旦遭受群体攻击,确实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

“公众人物”。一些人能从对“公众人物”的竞相攻讦中,获得愉悦感和满足感。而且出于从众心理的安全感,群体性的网络暴力是无意识的,更容易逾越道德和秩序边界。除非真受到血的教训,否则网络暴力参与者很少会产生内疚感。

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概念,即对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阻止甚至从众参与。网络暴力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平庸之恶。单独地看某个具体的网络暴力参与者,他远非恶贯满盈,但当点滴语言叠加起来,就会呈现出巨大的破坏性。

令人担忧的是,当网络暴力成为习惯,成为网络舆情的运作模式,就会有人利用其特点谋求

## 开学在即,留守儿童缺的是什么

## 调查观察

“作业本用完了,妈妈就该回来了”“山上下雪了,爸爸就能回家了”……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开学固然是新学期的起点,却也意味着一次别离,意味着再一次的留守。

暑假里,一些留守儿童还能被父母带到打工地团聚。暑期结束后,这些“小候鸟”却只能万般不舍,告别父母回到家乡。村口公路边、镇上汽车站,是分别的地方,也是留守的起点。

在不少深度贫困地区,留守儿童与贫困儿童这两个群体高度重叠,家庭负担重,经济收入有限,父母外出务工……家乡不能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家人也没有能力陪伴他们成长。

以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云南省镇雄县为例,这个县有 170 万人,是云南省人口第一大县。为了生计,镇雄县约有 50 多万人离开家乡外出务工,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把子女带到城镇念书,但很大一部分孩子只能留在大山里。据镇雄县民政局不完全统计,全县留守儿童约有 4 万多人。

对于很多留守儿童来说,能与他们常年做伴的,只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隔代人之间的年龄相

本报记者 白靖利、王研

## 城市道路反复开挖为哪般

反复开挖、动辄封路、没有手续就动工……昆明市人民西路近年来屡遭市民诟病。老问题“顽疾难除”的背后,有规则意识不强的原因,更是城市管理失准、民生功夫不足等诸多弊病的体现。

结合市民印象和媒体报道,作为昆明市中心主干道,人民西路自 2010 年以来已因修建地铁围挡、过渡性修复、地面隆起等多次开挖。往往是铺好没多久又出问题,于是再度开挖,形成“永远是工地”的场面,严重影响市民正常的交通出行,也因施工带来严重的噪音和扬尘等污染。

除此之外,手续不全就开挖的“任性施工”更让市民难以接受。据媒体报道,施工方中建三局称因为施工方案、图纸的改变,于是导致 7 月底铺好的路 8 月中旬又再度开挖。但颇为蹊跷的是,不仅警方对施工毫不知情,连供电和电信部门工作人员也在闻讯后前往现场阻止施工。在一个路口因施工挖断水管后,住建部门竟然称管理的工程太多,对开挖一事还没有关注到,并称“有可能他们与相关部门比较熟,边开挖边沟通吧”。

城市要发展,修路搞建设无可厚非,但一条城市中心主干道反复开挖究竟为哪般?如果涉及的部门太多,能不能事先规划周全、协调妥当,争取一次就修建到位?电、水、气、通信等部门依旧各自为政,表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还是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管理。精准化、精细化管理依旧任重道远。

对城市道路进行建设或修缮,势必对公共交通造成影响,必须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但此次施工单位没有履行相关手续就开挖,负责人以“我不清楚,我才刚来”搪塞,施工人员在供电、电信人员阻止时依旧施工。而住建等部门存在的包庇嫌疑更是滑稽——“与相关部门比较熟”究竟有何深意?“边开挖边沟通”挑战的又是谁的权威?荒唐的言辞背后,直指相关部门的管理失序,以及规则意识的严重缺乏。

城市管理理应做足民生功夫。城市道路反复开挖已是不少城市的顽疾,每次无序施工都是对市民正常生活的挑战,每次任性开挖都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打击。而昆明市人民西路反复开挖,影响市民正常的工作生活,反映城市管理的水平低下。迟迟不能“还路于民”的背后,是一些部门对群众利益的漠视。期待少一些任性开挖,尽早“还路于民”。

网络暴力,是舆论空间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与现实社会中暴力行为的个体性不同,网络暴力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由群体主导。在互联网早期的论坛时代,网络暴力就初现端倪。到了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暴力言论更是甚嚣尘上。

有两个最新案例:一是 8 月 25 日,四川德阳一名女医生在游泳池与一个小男孩发生冲突,双方报警,警方具体说法还没出来,男孩家人就把剪辑过的视频发在网上,引得很多网友开始抨击女医生和她的丈夫。因不堪压力,女医生选择了自杀。二是老戏骨周海媚在热播剧《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扮演反派角色时演技太好,一些“入戏太深”的观众对她开展了持续数周的人身攻击,最终迫使她退出了微博。

这些事让很多人想起了 2012 年上映的电影《搜索》。电影女主人公叶蓝秋遭遇,真实地说明了网络暴力的危害:一名花季少女,有令人羡慕的美貌和体面的工作,可因为坐公交车时说的一句气话而招来“小三”等污名,并因此遭到人肉搜索,最后无处可逃,选择自杀。